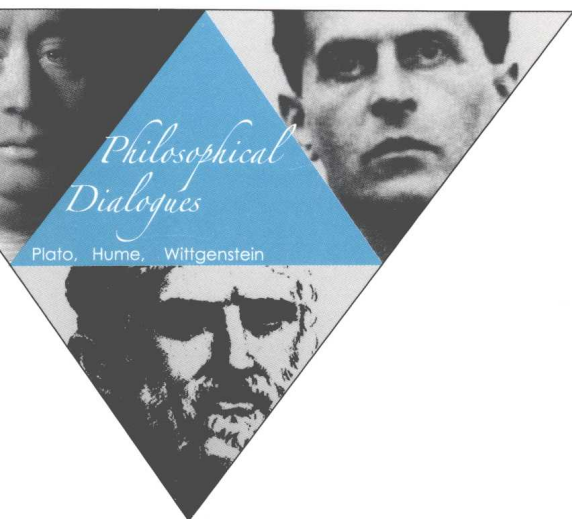




哲学对话

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

- 戴维·塞德利 David Sedley
- 乔纳森·丹西 Jonathan Dancy
- 简·希尔 Jane Heal

漓江出版社

013038772

B502. 232
57

(英) 蒂莫西·斯迈利 编 张志平 译
Timothy Smiley

哲学对话

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Plato, Hume, Wittgenstein

- 戴维·塞德利 David Sedley
- 乔纳森·丹西 Jonathan Dancy
- 简·希尔 Jane Heal



北航

C1646397

B502.232

漓江出版社
桂林

57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Plato, Hume, Wittgenstein

© The British Academy 1995

This translation of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Plato, Hume, Wittgenstein*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95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ume 85 and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ritish Academ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3-0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对话:柏拉图、休谟和维特根斯坦/(英)斯迈利(Smiley, T.)编;张志平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407-6432-6

I. ①哲… II. ①斯… ②张… III. ①柏拉图(前 427 ~ 前 347)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②休谟, D. (1711 ~ 1776) - 哲学思想 - 研究 ③维特根斯坦, L. (1889 ~ 1951)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02. 232 ②B561. 291 ③B561.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5776 号

责任编辑:吴晓妮

装帧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4 字数:70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序言

有相当多的哲学家——其中有许多都是最伟大的——至少在写作他们的某些著作时采用了对话形式。每个意料之中的名字之外还会出现另一个(笛卡尔、斯宾诺莎……),而当学科的专业化和期刊的不断增长几乎要让这种体裁消失时,它又在拉卡托斯(Lakatos)的《证明与反驳》(*Proofs and Refutations*)和斯克鲁顿(Scruton)的《尖嘴薄舌的对话》(*Xanthippic Dialogues*)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选择对话形式的理由通常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是说服别人的绝好手段,因为,尽管在论战中经受着被连续辩驳的考验,作者的观点最终还是获得了胜利。在另一个极端,对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来说,乌龟对阿基里斯所说确实是公布一个连他自己也没有解的谜题的理想方式。学者们已看出一些不太明显的理由,例如诺曼·弗林克(Noram Flinker)就认为,霍布斯的《贝希摩斯》(*Behemoth*)就是故意以对话体裁来败坏这种体裁的名声。修辞学家也把对话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研究过,例如彼得·沃姆斯利(Peter Walmsley)的《贝克莱哲学的修辞问题》(*The Rhetoric of Berkeley's Philosophy*)

以及塞思·勒若(Seth Lerer)的《波伊提乌与对话》(*Boethius and Dialogue*)。不过,这种令人钦佩的学问通常并没有以任何具有哲学意味的方式,把对话的结构及其戏剧性的细节,与对话的内容或其作者的一些独特想法联系起来——如果只是因为通常并不存在这样的联系就好了。

而这正是本书的供稿者已经着手在做的事情。戴维·塞德利揭示了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对剧中人物在严格哲学意义上的运用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这篇论文也附带表明,完成这项任务对历史、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知识储备要求已达到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步。乔纳森·丹西研究的是《自然宗教对话录》中作者自己的声音的问题,但是他把它完全倒置过来,并根据休谟认识论的独特性而提出一种完全崭新的阐释。在有关哲学对话的研讨会上把维特根斯坦也纳入进来加以讨论,这或许是受到《拜伦在埃及》(*Byron in Egypt*)一书的启发。这本书的宣传广告语是这样开头的:“尽管拜伦从未到过埃及,但是,这种对诗人之缺席的证据充分的研究……”事实上,它是迈尔斯·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的创意。而简·希尔在此对《哲学研究》中的诸多声音及其与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主题构想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也完全证明了伯恩耶特创意的可取之处。

通过本书所收入的三篇演讲稿,读者就能了解到1994年3月在英国国家学术院举办的一日研讨会的议程。在过去四十年里,国家学术院筹办过一系列哲学史讲座,该讲座是遵照乔治·道斯·希克斯(George Dawes Hicks)教授的遗

愿而设立的,并得到他的捐赠支持。所有的演讲稿都被收录在国家学术院的《院刊》中,但是通过《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Rationalism, Empiricism and Idealism*, Oxford, 1986),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则让读者更容易地得到了一本围绕共同主题而编纂的演讲稿选集。编写一本论文集的想法继续使得这一系列更为有趣,并且更易进入学术界。我非常感谢三位道斯·希克斯讲座演讲者的合作,也要感谢国家学术院的两位同事:组织这次研讨会的罗斯玛丽·兰贝斯(Rosemary Lambeth)以及负责本书出版事宜的詹姆士·里文顿(James Rivington)。

英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蒂莫西·斯迈利(Timothy Smiley)

目录

1	演讲一
	柏拉图《斐多篇》的戏剧人物
	戴维·塞德利 (David Sedley)
37	演讲二
	“因为作者在此被抹去”：
	对休谟在《自然宗教对话录》中运用对话形式的哲学反思
	乔纳森·丹西 (Jonathan Dancy)
83	演讲三
	维特根斯坦与对话
	简·希尔 (Jane Heal)
114	译后记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Plato, Hume, Hegenstein

演讲
一

柏拉图《斐多篇》的戏剧人物^①

戴维·塞德利

苏格拉底并非第一位进行哲学对话的人，柏拉图也并非第一位书写哲学对话的人。但是，由于柏拉图作为剧作家、哲学探索者和散文大师的独特天赋，他对交谈中的苏格拉底的刻画也就为这种体裁的写作树立了标杆。如果说柏拉图对这种艺术形式的处理是精妙绝伦的，那么其中的一个原因将会是：对他来说，对话**就是**哲学。甚至“辩证法”——他用来表示正确的哲学方法的术语——从非常字面的含义上讲就是指进行对话的学问。

众所周知，柏拉图哲学经历了从早期着重叙述其老师苏格拉底的思想，到中期主要表述他自己的理念论（theory of Forms），再到晚期借助新的视角和方法重新思考其以往想法的发展。对话形式本身在发生改变，这也是一个众所

^① 1994年3月12日宣读于英国国家科学院，见《英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85期，第3—26页。

周知的事实。早期阶段,令人难忘的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探问他所遇到的那些人的信念、生活和价值体系,并羞辱他们、开导他们或者更经常地只是简单地挫败他们,所作的一览无遗的描述。而后,我们却趋向于发现,苏格拉底——或者代替他成为主要发言者的不论什么人——在把其对话者变成发展其自己的建设性见解的搭档。

与这些众所周知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种发展,它很少得到专门的考虑,但是如果我的看法没错的话,它却能给这种多维的研究路径(multi-dimensional medium)增加另一种维度。下面,我的讨论就将集中在柏拉图实际上是如何对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进行角色分配这一点上。^①

二

尽管我主要关注的人物将是西米亚斯(Simmias)和克贝(Cebes),但还是让我从另外一组对话者也就是格劳孔(Glaucon)和阿狄曼图(Adimantus)开始吧。他们是柏拉图的兄弟,并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他们也是《理想国》(*Republic*)中大多数时候苏格拉底首要的对话者。而《理想国》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通过构建理想城邦来论证实现正义的好处。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注意到,对此二人,苏格拉底都仅

^① 在此,我要感谢英国国家学术院“哲学对话”专题研讨会的很多与会者对文本的评论,也要感谢 Theodor Ebert 和 Myles Burnyeat 对本文初稿的详细批评。

在一种情形下借其父名称之为“阿里斯通之子”(son of Ariston)。这两次称呼都发生在很关键的时候,并且,苏格拉底都很大方地对当事人的发现给予肯定。在第4卷(427c 6 - d 1)中,在完成他对理想城邦的构建时,苏格拉底对阿狄曼图评论说:“那么,阿里斯通之子,到目前为止,你们的城邦是会被建立起来的。”而在第9卷中,在他的整个论证达到高潮时,苏格拉底问了格劳孔一个结论已包含在其中的问题:“我们是雇一名传令官呢,还是由我自己来宣布:阿里斯通之子断定,最善良、最正义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也就是最具王者风范并给自己作王的人……?”(580c)

更明确地说,“阿里斯通之子”第一次是指阿狄曼图,而第二次则是指格劳孔。但是对于当代读者来说,这种借父名(在古希腊就相当于姓)对其子的称呼当然首先指的是比他们更著名的兄弟——柏拉图本人。当《理想国》最终占上风结论被归于“阿里斯通之子”时,此时被庆祝的必定首先是柏拉图自己的荣耀时刻。

一旦我们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开始体会柏拉图隐藏其自指(self-reference)的妙处。更明确地说,正是苏格拉底的工作使得那些结论得以达成,而格劳孔和阿狄曼图所起的只是应答者的那种次要作用。因此,从表面上看,苏格拉底把对话的哲学果实赠予他们,即使不能说是反讽的,也是不合常理地过于大方了。但是,从作者的层面讲,苏格拉底对两兄弟的肯定却要反过来想。的确,正是柏拉图,这位“阿里斯通之子”,引导他所尊崇的老师苏格拉底对正义作

出最终辩护——特别是通过他自己的理念论和三部分灵魂说(doctrine of the tripartite soul)^①。不论是在其顺畅时期(如在《理想国》中),还是在其艰难时期(如在《巴门尼德》中),柏拉图赠予苏格拉底的理念论礼物,都从未曾收回。也就是说,在那些对话中,苏格拉底一直都是理念论的主要代言人。

我们在此所看到的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借此方法,一篇对话中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互动就能帮助柏拉图发出他自己作为作者的声音。^② 这同一现象的另一面,在《理想国》之后,可以体现在柏拉图日益想让苏格拉底坐在听众席上的倾向中。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苏格拉底坐在很显然是毕达哥拉斯哲学追随者的蒂迈欧旁边,聆听他系统地把世界解释为神之理智(divine intelligence)的产品。这种对演员的重置,即把苏格拉底降为被动的角色,肯定意味着柏拉图已经意识到,他所继承的苏格拉底遗产已不足以为其目的论的科学事业奠定基础,因而,他现在必须吸收毕达

① 即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三部分构成。——译注

② Michael Frede 在其非常出色的研究“Plato's arguments and the dialogue form”(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suppl. Vol., 1992, 201-19)中说:“甚至在最少怀疑和最武断的对话中,柏拉图都仍与对话中那些虚构人物的观点和论证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p. 214)。在此处和别的地方,与他相比,我更倾向于探明作为作者的柏拉图自己的声音。就怀疑性的对话而言, Frede 对其发现的辩护非常具有启发性,但是我不太愿意相信,所有这些世纪以来,我们从后-怀疑性的对话中解读出“柏拉图主义”的伦理学、心理学或形而上学会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事实上,不假定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就是蕴涵在由其主要发言人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中的观点——正如 Frede 自己,例如,在同年发表的一篇论文“The Sophist on false statements”(R. Kraut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1992, 397-424)中所做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哥拉斯主义以使自己的思想取得新的进展。并且,同样的想法,即挑选不同的发言人以代表不同的哲学传统的想法,还成为柏拉图后期对话一个主要的形式化特征。尤其是,尽管他确实是在《斐利布篇》(*Philebus*)中曾回到对苏格拉底遗产的探究,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却忙于研究爱利亚学派的哲学遗产。巴门尼德在以其命名的对话中主导着讨论,并用严密的和分析的方法论给年轻的苏格拉底上了一堂论证课;柏拉图需要这样一种方法论,来为自己的理念论作出充分辩护。而当巴门尼德的追随者,那位从爱利亚来的佚名的陌生人,在《智者篇》(*Sophist*)中接任发问者的角色,而苏格拉底却被变成沉默的旁观者时,毫无疑问,爱利亚学派严密而精确的方法论又一次被摆在了显著位置。

由此可见,在柏拉图后期著作中,对发言人的选择具有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价值;它体现出,在用不同的人物来表明他自己的哲学资源时,柏拉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今我们可能会把这种做法当成是要表明他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相比之下,在其早期对话中,柏拉图所选择的发言人要么是作为苏格拉底所反对的观点的支持者,例如,卡利克勒(*Calicles*)、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等;要么是作为那些固执己见但却逻辑不清的个体的典型,例如,欧绪弗洛(*Euthyphro*)、美诺(*Meno*)等,他们的价值体系很自然地成了苏格拉底辩驳的靶子。那么,人物选择方法从早期到后期的转换是在何处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在柏拉图最重要的伟大著作《理想国》中,对人物作出象征性选择还没有

成为其写作技巧已定型或最突出的部分。在我所描述的对“阿里斯通之子”的双关使用中,我们仍在见证它的诞生过程。不过,认为那种诞生过程开始得还要早些,它在《斐多篇》中就已经开始,这却是我自己的论点——并且它也是本文的主要议题。

为了让这一想法可以被接受,我想举一个能把《斐多篇》与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些对话中的一个联系起来的例子。在《斐多篇》96—99中,苏格拉底讲到了他自己早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抱负。当他听说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把理智(Intelligence)称为万事万物的原因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找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会对世界结构作出目的论解释的人。但是,当他开始阅读阿那克萨戈拉的著作时,苏格拉底却失望至极:作者根本就没有对理智组织世界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作出任何解释。在结束那段插话时,苏格拉底评论说:“为了了解这种原因,我会乐于做任何人的学生。”(99c)毫不奇怪,有人把这句话错译为“我本来会乐于做任何人的学生”,以此暗示过去未曾实现的想法。因为苏格拉底在死囚牢房中离死亡只剩下一个小时,而他这时候如果还为自己将来的科学课制订计划,即便只是假想,也会

让人觉得很奇怪。^①但是,那就是希腊文很明显隐含的意思;一旦我们明白这种对将来的规划并不真的是苏格拉底的,而是柏拉图的,那么这个谜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得到破解。正是作者的声音在直接向我们讲话。^②这是柏拉图在对将来的对话进行构思:在其中,为了学习目的论科学,苏格拉底将成为某个人的学生。通过“后见之明”,我们可以很自信地断定这一点,因为事实上柏拉图在有生之年也写过那种对话,它就是《蒂迈欧篇》。在其中,苏格拉底,正如他在《斐多篇》中所设想的那样,成了蒂迈欧的学生,并向他学习世界如何能被解释成理智的产物。正如我说过的那样,选择表面上看是毕达哥拉斯追随者的蒂迈欧作为新的主要发言人,这意味着目的论科学只能从柏拉图所继承的苏格拉底遗产之外引出。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甚至早在《斐多篇》中,柏拉图就在承认,这项规划,当其时机到来时,将需要一位新的主要发言人来引入某种非苏格拉底的东西。结果证明,从根本上讲,尽管不是唯一的,这种非苏

① 我认为,苏格拉底并不是在假想着,将来他会跟一位他在哈得斯(Hades)遇到的“更优秀的人”学习(63b)。从《申辩篇》(Apology)开始,对遇到“更优秀的人”的预期就被再三重复着(参较《申辩篇》63b 4-5和69d 7-e 5);或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各个对话之间的连贯性,但是,很明显,他对这种预期的信心,与他死后有神灵作伴的期待相比,已经大大降低了(63b-c)。并且,这种神话(myth)的结尾也并未提及在哈得斯会遇到“更优秀的人”。我认为,这种新的强调说明,柏拉图转而把传统的哈得斯神话(Hades mythology)重新解释为象征着死后灵魂与肉体的彻底分离。

② 在“Teleology and myth in the *Phaedo*”(Proceedings of the Boston Area Colloquium in Ancient Philosophy, 5, 1989)中,我已经发展了与现在这段话和这个神话有关的这一论点。甚至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著名的临终遗言也暗示柏拉图将是他的继任者——这一论点如今已被 G. W. Most(‘A cock for Asclepius’, *Classical Quarterly*, 43, 1993, 96-111)做了极好的论证。

格拉底的东西就是柏拉图对宇宙结构所作的数学分析,而这种数学分析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三

现在,我终于可以完全转向《斐多篇》中的戏剧人物(dramatis personae)了。《斐多篇》采取的是对话套对话的形式。也就是说,先是在佛利(Phlius)的斐多及其朋友厄刻克拉底(Echecrates)之间的对话;在此对话的“框架”内,再通过斐多的叙述引出苏格拉底与其他人之间的对话。斐多向厄刻克拉底叙述的是苏格拉底在死刑前数小时内与其他人的最后谈话。迄今为止,不仅斐多和厄刻克拉底对柏拉图的读者来说是陌生的,甚至被转述的对话中的两个主要的参与者西米亚斯和克贝在柏拉图以前的著作中也几乎没有被提及^①。应该如何解释柏拉图对主要人物的这种选择呢?撇开柏拉图只不过是历史事实所限这种极小的可能性不谈,我们必须转而考虑把他对发言人的选择解释为是象征性的。

首先是斐多。他不仅是叙述者,而且也是涉及关键内容的对话者。我们知道,斐多是在埃利斯(Elis)成为有自己学派的、独立的哲学家的。在其著名的对话《左披洛司》

^① 事实上只在《克里托篇》(Crito)45b处提到过。不过,他们是作为与苏格拉底长期交往的同伴而被提及的(Phd. 7e),而这一点也从色诺芬(Xenophon)的《回忆苏格拉底》1.2.48和3.11.17中得到了某种确证。